

“2010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项目(课题编号为201003249)

日源外来词探源

日系外来語の語源研究

崔 崧 丁文博◎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013029129

H363.9
02

“2010 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项目(1)

日源外来词探源

崔 崑 丁文博◎著



H363.9

02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北航

C1637562

01308815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源外来词探源/崔崑,丁文博著. —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
广东有限公司,2013.1
ISBN 978-7-5100-1318-8

I. ①日… II. ①崔… ②丁… III. ①日语—词源—研究
IV. ①H36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7165 号

日源外来词探源

策划编辑 宋 焱
责任编辑 黄 琼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1318-8/H·0795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前 言

中国汉字词的传入带给日本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样,和制汉字词的流入带给中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语言文化的交流自古以来就是双向的。长期以来,日源外来词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祖国的语言宝库,而且在我们的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正在发挥也必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一、本书的研究方向

从纵向看,中日两国学者已对日源外来词词汇史的研究有所涉及。但是,从时间段上看,它们主要集中在近现代——即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前后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针对日本古代至江户末期这一段时间的研究不仅数量稀少而且缺乏系统性。而对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至今此研究领域几乎无人问津。本书的研究重点恰恰是这段时期的日源外来词。

众所周知,与来自西方各国的外来词不同,由于中日两国共同使用大量的汉字,源自日本的外来词不是借音而是借形,即中日两国的词形是相同的。这些来自日语的汉字词融入汉语后发生了哪些变化?分布在哪些领域?呈现什么特征?给汉语带来哪些影响?命运如何?等等,都是本书的研究对象。

从横向看,中日两国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日源外来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然而,这些研究主要注重语言,文化交流的某一阶段的某一侧面,有机地、全方位地论述日源外来词的研究尚未出现。历来的词汇学研究只注重语言本身的问题,本书是将“日源外来词探源”

的研究放在文字、语言、文化、社会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二、本书的研究方法

1. 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就词汇学研究领域而言,“定量”与“定性”是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定量统计与定性研究相辅相成,定量研究是定性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定性研究是定量研究的目的和结果。没有一定范围的定量研究,就谈不上客观的、科学的定性研究。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前是以《汉语外来词辞典》、改革开放后是以各语料库、权威刊物、代表论著、媒体网络等作为定量统计的原始资料。

2. 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

所谓探源研究,顾名思义就是要追根溯源,挖掘日源外来词的原始出处。首先,本书注重对日源外来词的发展史和学术研究史的研究,把握历时发展的规律和人们的认识过程。另外,古为今用,历时研究是为今天的语言学发展服务的。只有分析比较各个阶段日源外来词的特征,才能更好地认清外来词今后的发展方向,纵横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平面。

三、本书的研究视角

1. 语言视角

日源外来词是现代汉语词汇中的一员,它所承载的首先是语言的符号。这是本书采用的最根本的研究视角。既然是语言现象,我们可以从语音、文字、词汇、语义、语法、语用等各种学术角度来研究它。本书主要采用词汇学的研究视角,以此为基础去联系和参考其他方面,特别是汉字与汉字词的关系。日源外来词的组成部分是汉字,汉字是核心、是灵魂,只有把汉字与汉字词的关系说清楚了,才能最终挖掘到日源外来词的源头。

2. 文化视角

文字是语言的载体,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汉字词与语言有联系,又与文化密切相关,它们原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日源外来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日本、中国语言文化的融合,具有语言文化的双重性,因而它又必然是文化的一种符号。

3. 社会视角

借形词还是社会活动的参与者,它反映社会的变动,反映使用它的社会成员的层次类别。每一次剧烈的社会变动必将导致新词的大量涌现。所以它又必然是社会的一种符号。日源外来词具有语言、文化、社会三种符号身份。

4. 教育视角

时至今日,中日两语存在的大量同形词一直是日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只有将中日同形词的起源、特点、联系、注意事项等论述清楚了,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这些必须以日源外来词研究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源外来词研究对于推动中国的日语教育有着异乎寻常的积极意义。

四、本书的研究思路

首先确定汉语日源外来词的定义、身份及研究范围,特别是日源外来词与和制汉字词的渊源。然后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收集到的文献中(包括文本和语料库)的日源外来词进行归类汇总,分两个阶段论述汉语是如何吸收来自日语的外来词。借助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从语音、构词、语法、语义的角度对日源外来词进行深入的、系统的分析和研究。然后以语言文化学的理论为指导,找出汉字、汉字词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探究汉字词在中日两国的社会以及民众文化生活的作用和社会对语言、汉字词的影响和制约。

全书由五章构成。第一章,日源外来词的历史沿革;第二章,回归借词身份论考;第三章,原语借词的产生与发展;第四章,日源外来词新词;第五章,汉字·汉字词与社会文化。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吉林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经贸日语系讲师丁文博做了大量的数据调查和资料整理,并参与了部分章节的撰写。另外,笔者曾参阅了大量的中外文献资料,谨对原作者表示由衷的敬意。

崔 崧

2012年10月

目 录

1 日源外来词的历史沿革	001
1.1 何谓“日源外来词”	001
1.2 日源外来词的产生与沿革	003
1.2.1 日源外来词的产生	003
1.2.2 1840—1895 年的日源外来词	005
1.2.3 1895—1919 年的日源外来词	011
1.2.4 1919—1937 年的日源外来词	015
1.2.5 1937—1984 年的日源外来词	017
1.2.6 1984 年以后的日源外来词	020
2 回归借词身份论考	024
2.1 日源外来词的分类	024
2.1.1 和制汉字词缘何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024
2.1.2 日源外来词的分类	025
2.2 回归借词的考证	032
2.2.1 回归借词的鉴别依据	032
2.2.2 对回归借词的分析	040
2.3 小 结	047
3 原语借词的语言特征	050
3.1 原语借词的接受方式	050
3.1.1 原语借词的产生及分类	050
3.1.2 原语借词的接受方式	052

3.2 被淘汰的原语借词	053
3.2.1 数量分析	053
3.2.2 对淘汰词的分析	057
3.3 进入现代汉语常用词汇的原语借词	061
3.3.1 原语借词的语言特征	062
3.3.2 原语借词的异变	069
3.4 小 结	079
4 日源外来词新词	082
4.1 日源外来词新词的数量调查及分类	082
4.1.1 调查对象的选定	083
4.1.2 调查步骤	084
4.1.3 调查结果	085
4.1.4 日源外来词新词分类	086
4.2 日源外来词新词的语言特征	089
4.2.1 日源外来词新词语音、语法特征	089
4.2.2 日源外来词新词构词特征	092
4.2.3 日源外来词新词语义特征	098
4.3 小 结	101
5 汉字、汉字词与社会文化	104
5.1 汉字在日语中的地位与作用	105
5.1.1 汉字——语言学习的难点	106
5.1.2 汉字——联系日本文化的桥梁	107
5.2 日语汉字读音	109
5.2.1 汉字读音之难点	109
5.2.2 汉字音读和训读音	110
5.2.3 两字熟语的读音	111
5.2.4 日本人名、地名的读音	112
5.2.5 日语数量词的读音	114
5.3 从「一」字看日语汉字与汉语词汇的关系	116
5.3.1 从读音规律看「一」	118

5.3.2	从构词成分看「一」	118
5.3.3	从语义功能看「一」	119
5.4	评日语汉字的改革之路	120
5.4.1	语言学习的弊端——汉字	120
5.4.2	汉字废除论的提出及发展	121
5.4.3	限制汉字的具体措施	122
5.4.4	“当用汉字”与“常用汉字”	123
5.4.5	汉字为什么不能废除	126
5.5	日本“新常用汉字表”带给我们的启示	128
5.5.1	汉字在日本文化、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	129
5.5.2	“新常用汉字表”带给我们的启示	130
5.5.3	“新常用汉字表”的不足	133
5.5.4	对日本汉字改革的建议	134
5.6	日本人名与汉字文化	135
5.6.1	日本人姓名面面观	135
5.6.2	日本人名用汉字的变化趋势	137
5.6.3	从汉字的取舍看日本人的喜好	139
5.7	文化背景下的中日同形词	141
5.7.1	中日两国是同文同种吗	142
5.7.2	有关中日同形词的讨论	143
5.7.3	同形词的利弊	143
5.7.4	如何处理教学中的中日同形词	145
5.8	中日同形同义词同义吗	147
5.8.1	从语义学的角度看中日同形词	148
5.8.2	从语用学的角度看中日同形词	149
5.8.3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中日同形词	150
5.9	日语新词构词特征	153
5.9.1	新词的认定和分类	153
5.9.2	新语单纯词构词特征	156
5.9.3	新词复合词构词特征	160

附表 1	173
附表 2	178
附表 3	183
附表 4	187
参考文献	190
后 记	195

1 日源外来词的历史沿革

1.1 何谓“日源外来词”

说到日源外来词,首先就要谈到外来词。外来词不同于外国语词,外国语词是完全不同于本民族的外民族的词语,如英语词、俄语词、日语词等。外来词是指本民族语言从外国或其他民族语言里吸收过来的词。它们和其他任何汉语词语一样,都是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汉语词的一切基本特征和功能。虽然在书写形式上有的借自其他语言,而且目前绝大部分的汉语外来词都来自外国或外民族语言,但是它们在进入汉语词汇系统时都经过了汉语系统在语音、语义、构词等各方面的改造,可以说是充分汉语化了的外国语词,与原来的外国语词有着明显的、本质上的差别。有的则是完完全全的中国制造,带有极少的外来色彩。由于不同民族的人们要经常进行相互间的沟通和往来,本民族语言往往要从其他民族语言的词汇里借用过来一些需要的成分。所以外来词的吸收,也叫做“词语的借用”。外来词也称“外来语”、“借词”等。语言的接触有历史的必然性,这种接触必然引起语言的相互渗透。每种语言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在不断地吸收他民族的营养以丰富自己的语言体系,所以也就不同程度地存在外来词现象。其中尤以英语为甚,现代英语中的外来词比重已经超过 60%。日语中的外来词比重已接近 10%,如果加上从中国输入的汉字词及混种语词,总数已接近

70%。⁽¹⁾现代汉语里也存在大量的外来词,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1. 音译外来词

借用外国或不同民族语言的词,按照它们的声音形式翻译过来,这就是音译外来词。有的学者把它作为最典型的外来词或者称为“狭义外来词”。由于受音韵体系的制约,在进行翻译的时候,不可能翻译得同原来词语的发音一模一样,常常只能用一些近似的形式来代替。例如“奥林匹克”、“歇斯底里”、“巧克力”、“肯德基”、“克隆”、“沙发”、“咖啡”、“扑克”、“柠檬”、“戈壁”、“哈达”、“喇嘛”等。另外,近年来出现的表示固有词汇的英语缩略语词也应包括其中。例如“WTO”、“NBA”、“GDP”、“ASEAN”、“BRICK”、“CCTV”、“CBA”、“IMF”等。⁽²⁾

2. 音译兼表意的外来词

音译词当中,也有音译兼表意的,是音意双关的外来词。这些词是人们在借用或翻译外族词的过程中,既考虑到原词的发音又充分利用了汉字的表意性所形成的。例如“俱乐部”、“维他命”、“乌托邦”、“引擎”、“幽默”等。还有在音译词上增加表意成分的。它们构成了音译兼表意的一种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例如“冰淇淋”、“芭蕾舞”、“拖拉机”、“沙丁鱼”、“法兰绒”、“香槟酒”、“霓虹灯”、“啤酒”、“卡片”、“卡车”等。

3. 来自日语的借形词

日本明治维新后,受西学东渐的影响,日语中出现了很多用汉字书写的新造或意译的词,汉语就按照日语汉字的形式把这样的词借来应用。这是一种从日本流入的借形外来词,本书将它称为“日源外来词”。这种日制汉字词,使用的是汉语固有词素和固有构词法,是在日语中的汉字环境下由日本人所造,它借了词的形式,却不是词的语音形式,而只是词的书面形式,因此它是汉语中一种特殊的“借形词”。例如“社会”、“政党”、“主义”、“银行”、“会计”、“知识”、“小说”、“公园”、“宗教”、“广场”、“单位”、“电话”、“干部”、“课程”、“文明”、“图书馆”、“作品”、“主食”等,都是直接从日语中借来的。同音译外来词及音译兼表意的外来词不同,由于中日两国都使

用汉字,汉语在吸收来自日语的词语时,不是借音而是借形。日源外来词和其他汉语词一样,都是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汉语词的一切基本特征和功能。虽然在书写形式上借自日语,但是它们在进入汉语词汇系统时都经过了汉语系统在语音、语义、构词等各方面的改造,可以说是充分汉化了了的日语词,与原来的日语词有着明显的、本质上的差别,日源外来词在现代汉语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据意大利的汉学家马西尼的研究,在现代汉语前 3 817 个高频词中,有 143 个词是日源外来词。⁽³⁾考察日源外来词的来龙去脉以及进入汉语后的吸收消化、发展趋势也是本书的重点之一。

1.2 日源外来词的产生与沿革

1.2.1 日源外来词的产生

众所周知,汉字源于中国,是我们的祖先为了记述汉语而创造的文字。汉字的产生使中华民族先于其他大多数民族跨入文明社会。汉字是传播中华文化的主要工具,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血肉相连,不可分割。可以说,五千年的汉字史就是一部中国的文明史、中国的文化史、中国的思想史。汉字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汉字对周边国家特别是日本的影响也是巨大的。4 世纪前后汉字传入日本。由于汉字的输入,日本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文字。汉字、汉字词与中国文化的传播提高了日本社会的文明程度,极大地丰富了日本人的文化生活。如果从这一时期算起的话,汉语与日语之间借词的交流史已经存在一千七百年之久。据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调查,在现代日语中,由汉字构成的汉字词已占日语总词汇量的几近半数,汉字、汉字词已遍布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⁴⁾例如以下几类:

食物: 豆腐 煎饼 馒头 茶 菓子 纳豆 牛乳

植物：大豆 牡丹 林檎 菊 芭蕉 西瓜
 动物：骆驼 狮子 白鳥 豹 象 蜜蜂
 道具：屏風 障子 尺八 門 玄關 辞書 手帳
 人体：心臟 肝臟 腎臟 肺 腦
 抽象：自由 民主 貧乏 正直 意外 哲学
 数词：一 三 十 百 千 万 枚 本 匹 個

日语的外来词原本是用片假名书写的。汉语词汇来自中国，理论上属外来词，可是，至今仍然用汉字书写。这种情况在其他任何语言中是不可想象的。古代的中国，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那个时期的词汇交流几乎都是由中国输往日本。历史上曾经家喻户晓的遣隋使、遣唐使就是日本向中国学习的有力佐证。但是，词汇的交流同文化交流一样，一开始就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

西晋陈寿撰写的中国正史《三国志·魏书》，恐怕就是中国古籍中最早记载来自日本的史料。例如，国名“狗邪韓國、末卢國、伊都國、奴國百里、不弥國百里”，官名“卑狗、卑奴母離、尔支”，人名“卑弥呼、卑弥弓呼素、伊声耆”等。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记载这些名称的汉字已失去了表意功能，而且这些词在现代汉语中早已不见了踪影。

直到宋代，在杂史、笔记中才见到一些勉强称得上研究的文字，例如“手曰‘提’、眼曰‘媚’、口曰‘窟底’、耳曰‘弭弭’、面曰‘皮部’、心曰‘母儿’、脚曰‘又儿’、雨曰‘下米’、风曰‘客安之’、酒曰‘沙嬉’”等。至明代中叶，倭寇扰边，介绍或研究日本地理风俗的著作随之增多。其中不乏日本词汇的记录。例如《日本考略》收词 358 个，《日本考》收词 1 186 个，《日本一鉴》的卷五“寄语欄”收词 3 404 个。这些数目庞大的日语词汇，实际上都属于“寄语”或“译语”的性质。直至清末，一些东游日记在记载日语词汇时，才开始用汉字进行解释说明。如张斯桂《使东诗录》诗题和诗注涉及“八百屋、御料理、仙台味噌、玉子场、吾妻桥、大安卖、大问屋”等 13 个日语词。叶庆颐的《策蹇摭》中收录 130 个难以“望文生义”的日语词。⁽⁵⁾

1.2.2 1840—1895 年的日源外来词

前文谈到,在与外国、外民族交往的过程中,由于相互影响,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外来词。如果说,正常交往或交流所产生的外来词是少量的、渐进的,那么战争所带来的外来词则是大量的、剧烈的。1840 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历史近代时期的开始,也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始。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后,受西方的影响,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中都出现了大量的新词。这些词的相当一部分进入日本,后来又作为日源外来词回流到中国。1894—1895 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大清帝国的惨败而告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这场战争带给中国、中华民族乃至每一个中国人的影响是痛苦的、巨大的、深远的。自古以来,一向以泱泱大国自居的中国不得不对国土面积小于自己近 30 倍的邻国日本刮目相看。中国第一次全方位地、被动地、虚心地向日本并通过日本向西方国家学习。1895 年标志着中日关系新纪元的开始。社会的激变导致了语言特别是语汇交流方面真正意义上的互动,确切地说,是以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为主线。

1. 汉语对日语的影响

中国与西方的接触要远早于日本。如果说,日本与西方的正式接触是从 1853 年 7 月美国海军军官培利(Matthew Calbraith Perry,某些文献也翻成“彼理”)率领舰队访日谋求开放日本港口算起,那么中国可以追溯至元代。自明代开始接触逐渐增多,明末清初,西方的传教士(本书称为早期传教士)从海路陆续进入中国,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此后的百余年间,基督教传教盛行,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们为了学习中文以便于传教和通商,编撰了外汉字典,出版了很多有关教会的译著、著作等。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及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完全陌生的知识。撰写的西方著作主要集中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领域。18 世纪初爆发“礼仪之争”,康熙皇帝发布禁教令、锁国令,驱除外国的传教士。由此

近百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的传教活动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他们被迫转移到南洋活动,并以香港、澳门等沿海一带为据点秘密向中国内地渗透。但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西方对中国语言的影响甚微。

1807年,随着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华,基督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教活动才得以展开。1814年《新约圣书》、1819年《旧约圣书》的汉译本相继完成,至此,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开始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而战争使西方列强彻底打开了通向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前后,通过传教士(本书称为后期传教士)和商人,中国与西方之间首次带有根本性的语言接触出现了,除了政府直接派遣的外交使节外,传教士和商人是仅有的来中国旅行的西方人。为了传教和经商,他们翻译、编撰了数量可观的书籍。与此同时,与外国有关系的中国政府各部门、团体组织及个人也开始编撰、出版介绍西方各国的书籍和杂志。后期传教士翻译的西方著作,除自然科学外,也包括人文科学及国际法等领域。日本开国后,这些资料和文本的一部分同与基督教有关的汉译本一起陆续传到日本,被翻译成日语。日语中的新汉字词由此诞生。⁽⁶⁾下面介绍几部颇具代表性的著作。

1844年出版的《海国图志》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各国的百科全书。该书出版发行后经多次再版,而且每次再版后书中内容都大幅增加。《海国图志》的前身是由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从中国史书中摘录的材料,还转录了十多本由外国人用中文写的地理著作。这些著作绝大部分是由19世纪早期在华的新教传教士撰写的。《海国图志》还编入了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以及其他西方人所写的著作。⁽⁷⁾《海国图志》的出版不仅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反响,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在日本也有众多的读者。它的众多版本被反复翻译成日语。书中的一些词传到日本后,又作为“日源外来词”(准确说应该是回归借词)回流到中国。例如:“贸易、文学、法律、火轮船、火轮车、火车、公司、铁路、新闻、国会”等。

1848—1849年出版了由福建巡抚徐继畲撰写的《瀛环志略》，它是一部地理著作。它的贡献在于传播了西方国家的政体知识。与《海国图志》不同，该书的绝大部分由一个人撰写，书中内容直接从汉语著作中引用，文体更为活泼，而且易于查找。在用词方面，徐继畲意译词用得较多，音译词用得少。例如：“公会、爵房、乡绅房、正统领、总统领”等。这些词的绝大多数在现代汉语中早已不见了踪影。《瀛环志略》于1859年和1861年，在日本先后重印两次，1874年还被译成日语。

1857年1月—1858年1月，在上海出版了第一部以讨论科学为主的中文杂志《六合丛谈》。这是由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慕维廉、艾约瑟共同编写的。“六合”即天地四方之意。新教传教士们通过翻译，在中国致力于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在这本杂志中，还介绍了其他方面的西方文化，如地理学、希腊文学以及有关美国和英国国会体制方面的知识。该刊每期由三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是几篇署名文章；第二部分是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短篇报道；第三部分是经济信息，如贸易值、物价等。1858年，《六合丛谈》在日本重印；1864年，被翻译成日语，刊名为《官版六合丛谈》。从词汇角度看，该刊使用过的一些词曾在日本广泛使用，作为“日源外来词”又回流到中国。例如：“议院、议会、国会、文学、国债、统计、空气”等。

1862年8月20日，在北京创立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学习外语、培养研究国际关系的专门人才的学校——“同文馆”。从建馆到1898年这段时期，该馆翻译了约20本有关国际法及西方法律的著作。其中产生较大影响的是1864年出版的《万国公法》。该书译自Henry Wheaton的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Philadelphia, 1836)，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译成汉语。除《各国律例》^{〔8〕}外，《万国公法》是第一部有关国际法程序的汉语著作。这本译著在明治维新（1868年）前夕流传到日本。书中的许多新词对日本近代法律词汇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一些词，特别是词缀在现代汉语中仍然广泛使用。例如：“～权（特权、主权、权利）”、“自～（自主、自治）”、“上房”、“下房”、“公法”、“民主”等。

1868年出版了丁韪良编撰的另一部影响较大的著作《格物入门》。